

Research in Classics

荷马的阐释

古典学研究
刘小枫◇主编

第二辑

彭 磊◇执行主编

再论“荷马问题”中的口头与书面之争 / 陈斯一

《伊利亚特》中“宙斯的正义” / 张文涛

特勒马科斯游历记的政治寓意 / 贺方婴

普罗米修斯与民主的秘密（下篇） / 刘小枫

《丧服郑氏学》徵引文献论略 / 吴 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非外借



Research in Classics

荷马的阐释

古典学研究
刘小枫◇主编

第二辑

彭磊◇执行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学研究:荷马的阐释/刘小枫,彭磊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675-8424-2

I. ①古… II. ①刘…②彭… III. ①古典哲学—研究—世界—丛刊
②《荷马史诗》—诗歌研究 IV. ①B12-55 ②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7280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第二辑

古典学研究:荷马的阐释

编 者 刘小枫 彭 磊

责任编辑 王 旭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插 页 1

印 张 12.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424-2/B · 1159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

本刊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会主办

目 录

专题:荷马的阐释

1. 再论“荷马问题”中的口头与书面之争 陈斯一
20. “阿基琉斯之盾”的阐释传统 肖 剑
34. 《伊利亚特》中“宙斯的正义” 张文涛
52. 特勒马科斯游历记的政治寓意 贺方婴

论文

76. 普罗米修斯与民主的秘密(下篇) 刘小枫
109. 谁是新君主? 梁晓杰
126. 《丧服郑氏学》徵引文献论略 吴 飞
142. 胡培翬《仪礼正义》探论 潘 斌

书评

175. 末代英雄与神人分离 李孟阳

Contents

Topic: Interpretation of Homer

1. The Oral-Written Controversy of the Homeric Questions:
A Reconsideration Chen Siyi
20. The Interpretation Tradition of the Shield of Achilles in the
Iliad Xiao Jian
34. The Justice of Zeus in the *Iliad* Zhang Wentao
52.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Telemachus's Journey He Fangying

Essays

76. Prometheus and the Secret of Democracy (II)
——An Interpretation of Aristophanes' *Birds* Liu Xiaofeng
109. Who is the New Prince?
——An Interpretation on Machiavelli's *Mandragola* Liang Xiaojie
126. A Study of the Bibliography of *Mourning Apparel according
to Zheng Xuan's School* Wu Fei
142. A Discussion on Hu Peihui's *Ceremony and Rirtual* Pan Bin

Book Review

175. Last Heroes, Separation between Gods and Men
——Review of *Homer: The Resonance of Epic* Li Mengyang

183. ABSTRACTS

再论“荷马问题”中的口头与书面之争

陈斯一*

(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 18 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古典学界围绕荷马史诗的创作方式、作者身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等“荷马问题”展开了不休的争论,其中,荷马史诗的创作方式,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口头作品还是书面作品,是一个根本性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19 世纪“分析派”的盛行正是基于对书面创作之可能性的否定。到了 20 世纪中期,口头创作论在技术层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得围绕“荷马问题”的争论在全新的格局中展开。本文将口头和书面之争为线索,以口头创作论的发展为重心,简要概述“荷马问题”的现代学术史;以此为背景,本文将论证诗人荷马从事书面创作的可能性,从而为“统一派”提供一份全新的、更加有力的辩护。

关键词: 荷马问题 口头 书写 程式 艺术统一性

——

谁是荷马? 他生活于何时何地? 真的有过荷马其人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还是分别由两个诗人创作,抑或二者分别都有多个作者,甚至是许多世代的作者和编者不断修正和编排的产物?①

* 作者简介:陈斯一(1986-),男,四川绵竹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剑桥大学古典系博士,主要从事古希腊罗马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研究。

① 参见 Gregory Nagy, “Homeric Questions”, i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22 (1992), p. 17. 关于荷马问题的概述,参见 J. A. Davison, “The Homeric Question”, in A. J. B. Wace and F. H. Stubbings eds., *A Companion to Homer*, London, 1962, pp. 234-266; F. M. 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in Ian Morris and Barry B. Powell eds., *A New Companion to Homer*, Leiden: Brill, 1997, pp. 123-145.

这些古老的“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s)至今没有公认的答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讲,荷马问题的关键在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否具备艺术原创性和统一性(artistical originality and unity)。在现代荷马研究界,围绕上述问题而形成的争论最终分化为两种极端的观点(当然,在二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过渡立场):一方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平庸的编者拼贴而成的“劣质大杂烩”,^①另一方认为这两部史诗是同一位伟大的诗人极尽天赋和才华的不朽杰作。与这一争论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荷马史诗是口头作品还是书面作品?研究者在上述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是因为,荷马史诗的庞大规模和复杂结构导致我们很难接受单个诗人以完全口头的方式创作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可能性,而诗歌的艺术原创性和统一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诗人基于独特理念的个人创作。

18世纪末期以来,正是由于大多数古典学者否定了荷马掌握书写能力的可能性,导致现代荷马研究的“统一派”(Unitarians)和“分析派”(Analysts)之争呈现出后者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局面。然而,这场争论在20世纪中期开启了新的一页:一方面,口头创作理论的巨大突破,导致书写对于长篇史诗的创作来说不再必不可少;另一方面,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的进展将荷马史诗的创作与书写的重新发明大约置于同一个时代,令荷马从事书面创作变得可能。^② 这两方面的变化合力

① 虽然“劣质大杂烩”(miserable piece of patchwork)这一说法源自英语学界对德国古典学者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的误解(参见Veronika Petkovich, "A 'Miserable Piece of Patchwork'", in *The Classical World* 96[2003], pp. 315-316),但是它的确适用于许多分析论者对于荷马史诗的判断,见Davison, "The Homeric Question", p. 250; 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pp. 137-138; Frederick M. Combellack, "Contemporary Unitarians and Homeric Originalit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1 (1950), p. 341。相比之下,古代关于荷马其人和荷马史诗的诸多争论不曾撼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经典地位以及荷马的作者身份,见Davison, "The Homeric Question", pp. 238-242。

② L. H. Jeffery, *The Local Scripts of Archaic Greece: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Greek Alphabet and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Eighth to the Fifth Centuries B.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p. 10-57; H. L. Lorimer, *Homer and the Monuments*, London: Macmillan, 1950, pp. 526-527; G. S. Kirk, *Homer and the Epic: A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Songs of Hom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0-11, 197-201。

扭转了争论的局面:20 世纪中期以来的荷马研究不再主要由创作方式的口头和书面之争决定荷马史诗是否可能具备原创性和统一性,而是要求基于对荷马史诗的原创性和统一性的实际考察来判定其创作方式,这也导致荷马问题的研究方法逐渐从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回归于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而争论的焦点也逐渐集中在荷马史诗自身的艺术手法和思想价值。在本文的主体部分,我们将对 18 世纪以来现代荷马研究史的一些重要成果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以《伊利亚特》为重点讨论对象,为统一论提供一份新的辩护。

荷马史诗的统一性包含两个方面:形式的统一性和内容的统一性。前者指的是诗歌呈现的框架结构和情节脉络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后者指的是诗歌表达的道德系统和思想观念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尽管荷马史诗在上述两方面的统一性都是极具争议的,但是从现代研究史的实际状况来看,对于内容统一性的判断具有极强的主观性,而形式统一性的判断则是相对客观的。以《伊利亚特》第九卷阿基琉斯对使团的拒绝为例,这个桥段在一些学者看来完全不可理喻,以至于证明该卷是后人添加的伪作,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却展现了英雄价值的最高境界,以至于证明改卷是整部史诗的精神核心。^① 相比之下,在整部史诗叙事的时间跨度中,阿基琉斯对使团的拒绝发生在时间线的正中心,这一点则是毫无争议的。^② 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在于从相对客观的形式统一性出发,论证荷马史诗(特别是《伊利亚特》)是单个诗人(我们不妨称他为“荷马”)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书写进行创作的结果,从而推翻研究界通常用以否定荷马史诗之内容统一性的主要根据,即荷马史诗是非个人的口头创作的产物。以此为前提,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运用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荷马史诗的文本意义和思想信息,进而判断荷马史诗究竟是否具有内容方面的统一性,并挖掘其统一性的精

① 比如可参 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Volume 2*, Boston: John P. Jewett & Company, 1852, pp. 178-184; Walter Leaf, *A Companion to the Iliad, for English Reader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2, pp. 23-24; Kirk, *Homer and the Epic: A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Songs of Homer*, pp. 112-113; James Redfield,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 3ff.

② 关于《伊利亚特》的戏剧时间跨度究竟有多长,在研究界存在争议,但是在任何一种算法中,第九卷都处在时间线的中心位置。

神实质。不过,这个进一步的任务已经超过了本文的写作范围。

二

沃尔夫(Friedrich A. Wolf)于1795年出版的《荷马绪论》开启了现代研究界对于荷马问题的探究。^① 沃尔夫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当时希腊人尚未重新发明书写,因此,荷马只能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创作,其作品不可能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长篇巨制,而是短小得多的诗歌。这些诗歌经过后人口头传承了4个世纪之久,其间发生许多改动,甚至增加了后人创作的诗篇。最终,所有这些归于荷马名下的诗歌于公元前6世纪在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统治下的雅典被收集、整理、编辑,成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沃尔夫是现代分析派的先驱,受他影响,19世纪“几乎每一个德国古典学者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多个作者论’……他们阅读荷马史诗的时候总是在寻找情节、风格和用语的不一致”,^②特别是诗歌叙事中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和前后不一致(inconsistency)。然而,分析派看似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实隐藏着对于作品性质的深刻误解。史诗的意图并不是还原历史的真实,因此,诗人能够自由运用、安排和组合他所继承和掌握的来自迈锡尼时代、黑暗时代以及同时代的所有材料,而完全不必顾忌时代错误问题。^③ 根植于口头传统的长篇作品在叙事细节方面出现一些前后矛盾之处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在实际的表演中,无论是诗人还是听众都不见得真正在意这些细节;此外,一些表面上的前后矛盾之处其实是诗人为了实现特定的艺术效果而刻意为之。^④ 除了基

① Friedrich A. Wolf, *Prolegomena to Homer*, 1795,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nthony Grafton, Glenn W. Most, and James E. G. Zetz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参见 Davison, “The Homeric Question”, pp. 247–248; 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pp. 127–128.

③ H. T. Wade-Gery, *The Poet of the Ilia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5–37; Cedric H.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p. 27.

④ C. M. Bowra, *Tradition and Design in the Ilia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pp. 299–300, 比较 pp. 305–306; 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p. 133.

于时代错误和前后不一致而对史诗的各部分进行拆解和鉴定之外,不少分析论者的更为实质的研究思路,同时也是对于沃尔夫的研究方法的更为忠实的贯彻,是从(在他们看来)由后人拼合而成的史诗文本中区分出荷马的原初杰作,以便还原纯正的荷马史诗。^①然而,抛开各路分析论者无法就原初诗歌和后人添加成分的辨认达成共识不谈,从根本上讲,其研究方法实际上仍然是用19世纪典型的科学实证主义标准来批评荷马史诗的文本,这种处理方式对于任何诗歌来说都是不恰当的。^②而从更深的意义上讲,分析论的真正根源其实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研究者以远逊于荷马的精神容量来度量其作品的复杂结构,基于各自在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局限来武断裁剪史诗。^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分析派阵营内部五花八门、相互冲突的思路和结论导致“整个分析方法毁于自身的天才”。^④

让我们回到19世纪分析派阵营的根本前提:首先,荷马不会书写;其次,书写对于长篇史诗的创作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帕里(Milman Parry)对于荷马程式系统和口头创作方式的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口头诗人不再需要书写来帮助他们创作长篇作品,从而推翻了上述第二个前提。另一方面,新的考古发现和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将书写的重新发明与荷马的生活年代一同置于公元前8世

① 这些分析论者和沃尔夫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从荷马的原作到后人的添加和扩展是一个艺术统一性遭到破坏的退化过程(参见 Leaf, *A Companion to the Iliad, for English Readers*, pp. 26-27),而后者则认为从荷马最初创作的短诗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成型是一个逐步实现高度艺术统一性的进化过程。进化论以牺牲荷马的作者地位为代价承认了史诗的艺术统一性,而退化论则以牺牲现存史诗的艺术统一性为代价保留了荷马的历史地位,双方都不承认单个诗人能够创作出具备高度艺术统一性的长篇史诗。

②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pp. 1-3; 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pp. 123-126, 144-145; 比较《诗学》1461b11-12:“就诗歌而言,可信的不可能性要比不可信的可能性更可取。”

③ 以《伊利亚特》为例:拉赫曼(Karl Lachmann)认为这部史诗是由许多个“诗歌层”组合而成的,而格罗特(George Grote)的观点与沃尔夫更为接近,认为这部史诗是由荷马创作的一部以阿基琉斯的故事为核心的诗歌扩展而成的(Davison, “The Homeric Question”, pp. 249-250; 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p. 132)。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用分析派自身的方法来判定他们的观点孰优孰劣。

④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p. 3.

纪,为研究界重新开启了荷马运用书写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可能性,从而推翻了上述第一个前提。这两方面的发展共同改变了荷马问题的研究面貌,也让统一论和分析论之争在全新的基础上展开。

三

让我们从帕里的划时代研究谈起。^① 帕里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荷马程式系统”(Homeric formulaic system)的严密规则。^② 荷马史诗充满了重复,即便是不懂希腊文的现代读者,通过阅读相对忠实的译本也很容易发现大量反复出现的词语、短语、诗句、段落、场景描述、情节序列。事实上,荷马史诗的绝大部分语言都是由这些“程式化元素”(formulaic elements)构成的,它们是史诗的基本材料,而诗人正是通过对于这些元素的安排来进行创作的。基于细致的分析,帕里发现,荷马史诗的程式化元素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系统,几乎没有任何对象是无法用程式语言来表达的;进一步讲,该系统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它是极度“经济”(economic)或者“节省”(thrift)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在任何一行诗句中,“对于一个特定的观念(idea)和一个特定的节律位置(metrical space)来说,有且只有一个可用的程式(formula)”。^③ 面对如此严密的规则,诗人几乎在诗歌的任何部分都不具备选择用语的自由,甚至在某些地方会因为受限于程式之间的传统搭配而无法实现准确的表达。^④

① 帕里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对荷马史诗的程式化用语的文本研究,第二个阶段是1933-1935年对现代南斯拉夫口传诗歌的田野调查。由于帕里的意外早逝,这些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意义直到60年代才被他的同事洛德(Albert B. Lord)发表,而帕里生前的数篇文章由其子帕里(Adam Parry)编辑成册:Milman Parry,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Adam Parry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对于帕里理论的介绍和辩护,参见Lord, “Homer, Parry, and Huso”, i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52 (1948), pp. 34-44; Nagy, “Homeric Questions”, p. 24ff。

② 对于荷马程式系统的一份精简而准确的概述,参见Kirk, *Homer and the Epic*, pp. 4-9。

③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p. 7。

④ Denys Page, *History and the Homeric Ilia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0, pp. 225-226。

然而,这正是程式系统对于口头创作的意义所在:以牺牲表达的自由为代价,这一系统塑造的诗人获得了“在表演中创作”(composition-in-performance)的技术和能力:

在不存在书写的情况下,诗人得以创作诗句的唯一方式在于拥有一套提供现成短语的程式语系(formulaic diction),使他能够毫不犹豫地让这些短语形成连续不断的铺展,从而填充他的诗行,组成他的句子。^①

在即兴创作的每一刻,诗人想要在特定的节律位置表达的特定观念几乎总是只有一个恰好对应的程式,随着诗歌节律的流动,不同程式的组合构成了诗句与段落,讲述着特定的主题,而一系列主题的前后相继或者结构性呼应就形成了整首诗歌。正是以这种方式,一个熟练掌握程式系统的口头诗人不需要书写的帮助也能够创作长篇史诗。

帕里的口头创作论推翻了19世纪分析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掌握书写是创作长篇史诗的必要条件。^②然而,由于程式系统的高度机械性,该理论对传统的统一论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它几乎彻底取消了诗人进行自由创作的可能,从而倾向于将史诗的产生归结于以程式系统为核心的口头传统。用帕里自己的话来说:

诗人以程式的方式进行思考……他从来不会为了某个此前未被表达过的观念寻找对应的语词,因此,风格上的原创性问题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的。^③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帕里的发现堪称“现代荷马研究的第二次伟

① Parry, “Homer and Homeric Style”, in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p. 138.

② 帕里对于传统分析论更为根本的瓦解在于他所揭示的程式系统的均质性和融贯性。从拉赫曼开始,许多分析论者的主要工作在于分辨荷马史诗源自不同诗人和不同时期的组成部分,但是根据帕里的理论,荷马史诗真正的组成部分是程式,而程式系统又是一代代诗人在漫长的口头传统中逐渐积累打磨而成的,该系统在荷马史诗中展现出的均质性和融贯性使得拉赫曼式的分析不再可能。

③ Parry, “Homer and Homeric Style”, pp. 146–147.

大转折点”,^①但是其根本的思路其实回到了沃尔夫的“进化理论”,不同之处在于,沃尔夫认为荷马史诗的成型是从口头传承到书面整编的历史产物,而帕里则提出产生荷马史诗的程式系统是口头传统漫长积累的结果。^②这种积累的具体机制,在帕里最主要的追随者和捍卫者洛德(Albert B. Lord)的代表作《故事的歌手》中获得了系统的阐述。^③洛德将他和帕里对于现代南斯拉夫口头史诗的田野调查应用于荷马史诗的研究,在程式和主题(theme)这两个方面论证口头诗歌的传统性。他强调,口头创作的基础是诗人在漫长的学徒和表演生涯中习得的传统程式系统和传统主题库,个别诗人不仅“不会有意识地废除传统的词语和插曲,他受表演中的快速创作所迫而使用这些传统的要素”,而且“不同主题之间的习惯性关联……源自传统的深处,通过传统程序的运作获得不可避免的表达”。^④以这种方式,诗歌传统通过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口头创作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叙事骨架”,这才是史诗的“本质核心”。^⑤洛德据此断言: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误入歧途,没能理解荷马的诗艺及其伟大之处的真相……我们曾调动我们的想象力和智慧,在荷马史诗中寻找一种不相关的统一性、个别性、原创性。^⑥

到了20世纪末期,帕里最优秀的继承者纳吉(Gregory Nagy)将口头传统的进化理论发展到了极致。基于精深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纳吉将荷马程式系统自身的生成追溯至希腊民族用诗歌的方式讲述英雄主题的需要,甚至提出,六部格律本身就是诗歌语言为了精确表述英雄主题而对于自身的形式结构进行长达上千年的持续调节

①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p. 4.

② 韦德-格里将帕里称作“荷马研究界的达尔文”,而沃尔夫早在19世纪就受到过类似的批评,参见Wade-Gery, *The Poet of the Iliad*, pp. 38-39.

③ 20世纪30年代,洛德与帕里一同前往前南斯拉夫,对当地的口传诗歌进行田野调查。以详尽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洛德系统阐述并且进一步发挥了帕里关于口头诗歌的理论,主要参考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中译本参阅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

④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pp. 4, 65, 78, 97-98.

⑤ Ibid., p. 99.

⑥ Ibid., pp. 47-148.

的结果。纳吉的研究很好地克服了程式系统的机械性问题,从而扭转了口头创作论侧重程式而忽视主题的局面。^① 在其名著《最好的阿开奥斯人》中,纳吉深入分析了贯穿《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一系列关键词和多个中心主题之间的关联,展现了荷马史诗在“关键词展布”(deployment of keywords)和艺术统一性之间形成的精确对应,并指出,正是这种对应展现了荷马史诗对于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② 然而,与持荷马个人创作论的传统统一论者不同,^③纳吉完全取消了荷马作为个别诗人的地位,提出:“关键不在于荷马的天才,而在于以我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顶峰的整个诗歌传统的天才”;荷马史诗的“统一性或完整性源于史诗生成中创作、表演、扩散的充满活力的互动”。^④

纳吉极度强调诗歌传统的磨合而低估个别诗人创造力的观点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他虽然能够很好地解释荷马史诗的风格统一性(形式和内容的完美配合),但是无法真正阐明荷马史诗在世界观和人性论、道德风格和精神取向方面的高度统一。事实上,纳吉并不认为荷马史诗包含这种更加实质的统一性,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荷马世界”,相反,研究者应该对荷马史诗包含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诸维度”进行分析。^⑤ 纳吉对于荷马问题的处理主要在于阐述这些不同的维度如何在口头传统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整合为成型的《伊

① Nagy, *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3. 纳吉提出,“虽然从描述性的视角来看,确实是节律规定了用语,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一调节只是一个更加基本的原则的后果,即最终是主题规定了用语……主题是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类传统诗歌的统摄性原则”。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早就在《诗学》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参见《诗学》1460a2-5。

② Nagy, *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p. 4.

③ 在19世纪,沃尔夫理论给荷马研究界造成的最大冲击是荷马史诗的多重作者问题,作为对此的回应,传统的统一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荷马个人创作论。例如,尼策(G. W. Nitzsch)认为,荷马汇集和改进了前人的诗歌,以自己的天才诗艺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尔曼(G. Hermann)则提出“核心理论”(kernel theory),认为荷马创作了两首短诗,确定了诗歌的核心情节,后辈诗人以此为基础进行添加、扩展和改编,最终形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参见Turner, “The Homeric Question”, pp. 133-134。

④ Nagy, *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pp. 3-5.

⑤ Ibid., p. 28.

利亚特》和《奥德赛》，但是关于这个进化过程的实质，他只给出了一个相当空洞的说明，那就是新兴的城邦世界对于统一的泛希腊文化的需要。^① 统一的文化需要统一的经典，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伊利亚特》为何统一于阿基琉斯的愤怒，《奥德赛》为何统一于奥德修斯的回归？公元前8世纪以来的城邦世界为何选择这两位截然不同的英雄作为泛希腊文化的精神代表？虽然纳吉为我们探索上述问题提供了颇有启发性的线索，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给出系统的答案。例如，他极具洞察力地指出，作为两部荷马史诗的主角，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最好的阿开奥斯人”，他们的对立其实象征着力量和技艺、自然和习俗的对立。^② 然而，纳吉对英雄观念的研究更加侧重荷马史诗的英雄叙事和英雄崇拜(hero cult)之间的历史关系，而未能深入挖掘上述对立所展现的古希腊文化逻辑和精神结构，这当然和他对传统的强调密切相关。荷马史诗固然完成了对各个地方英雄崇拜的泛希腊整合，这是它在口头传统中集大成地位的展现，然而，它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实在于对英雄道德的系统呈现和深刻审视，这才是其精神实质的统一性之所在。^③

我们认为，正是这种难以通过口头传统的自然进化而产生的精神统一性使得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如下观点：一位名叫荷马的诗人，基于历史悠久的诗歌传统，以自己对于英雄价值之高贵与界限的独特洞察，在公元前8世纪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过，由于围绕荷马史诗的内容统一性的争论向来是极为主观的，基于内容统一性来判断创作方式的论证几乎注定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已经看到，帕里、洛德，甚至纳吉，都不承认荷马史诗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内容统一性。然而，在笔者看来，妨碍这一派学者承认荷马史诗的内容统一性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他们对于诗歌口头性与传统性的过度强调。要想解除这一障碍，我们需要从荷马史诗（特别是《伊利亚特》）的相对客观的形式统一性出发，论证其创作包含了高度个人的，甚至书面的维度。如果我们的观点成立，那么诗人荷马背后的口头传统就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品视作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并运用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来研究其文本；而唯有

① Nagy, *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pp. 115-117.

② Ibid., pp. 24-25, 45-49.

③ 参见 Kirk, *Homer and the Epic*, pp. 99-101, 112-113.

回归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才能从整体上把握荷马史诗的精神信息和思想意义。

四

20 世纪以来的荷马研究界见证了统一论的复兴。^① 作为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惠特曼(Cedric H. Whitman)在充分吸纳帕里和洛德的口头创作论的前提下,坚持认为《伊利亚特》是诗人荷马的个人创作。在惠特曼看来,无论是成型的程式系统还是现成的主题库都丝毫不会影响荷马的原创性。一方面,任何语言都或多或少是程式化的,而诗人的任务本来就不在于创造语言本身,而在于将现有系统中可用的单位转化为富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品;另一方面,人类可理解的故事主题和叙事情节的可能性从来都是有限的,而诗人的独创并不一定要求构想全新的题材,而完全可以展现为对现有题材进行独具匠心的安排和更加深入的审视,从而更为充分地展现其内含的精神视野。^②

在其代表作《荷马和英雄传统》中,基于对《伊利亚特》的形式结构的细致分析,惠特曼将这部史诗在整体设计方面的创造归结于“安提卡几何时代”(Attic Geometric Age)的精神氛围,提出:“荷马史诗结构的奥秘(至少对于《伊利亚特》而言)在于公元前 8 世纪晚期几何对称风格的心理机制对口头技术的整合。”^③ 几何艺术(Geometric art)和荷马史诗共享了大量英雄神话的主题,其中许多都取自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体现了公元前 8 世纪新兴的城邦世界(特别是雅典)试图与荣耀的迈锡尼时代重建联系的文化努力;^④ 不仅如此,二者在艺术风格上也是相通的。惠特曼认为,迈锡尼艺术是自然主义的、描述性的、静态的、平

① Combella, “Contemporary Unitarians and Homeric Originality”, pp. 337-339.

②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pp. 14-15. 汉语学界对惠特曼的荷马研究的评述,参考陈戎女,《论塞德里克·惠特曼的荷马研究》,载《国外文学》2007 年第 2 期。

③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p. 10. 对于该观点的批评,见 Kirk, *Homer and the Epic*, pp. 58, 187-188.

④ Hana Bouzková and Jan Bouzek, “Homer and the Geometric art”, in *Listy filologické/Folia philologica* 89 (1966), pp. 425-427.